

公众利益日遭漠视

(简体汉字翻译稿)

2000年5月13日，一个晴间多云的和暖星期六。

在北美，此时的时钟正指着上午9:15；这在中欧则为下午3:15。

这正是孩子们在户外嬉戏的时光。大人们则可能正在做家务、品咖啡，或者喝下一杯清凉的自来水。大家都在放松休息。

此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名叫沃克敦（Walkerton）的小镇，居民们可能正走在镇里的街道上，同熟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齐，一起前去镇边，看一眼水位上涨的索津河（Saugeen River）。头天白天和夜里，这个地区下了豪雨，结果河水漫上河岸，临河的公园和几条街道进了水，若干车辆也遭了淹。不过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似乎不严重。

此时，荷兰恩斯赫德镇（Enschede）托伦斯街（Tollensstraat）的住户，可能正放下自己正在干的事情，目送着从街上急驶而过的消防车——看来，街那头的纸制品厂出了火情。

蓦地，两声爆炸在起火的工厂响起，将窗玻璃震得粉碎。大量建筑残片被气浪抛入空中。居民们几乎来不及将孩子们送进屋里躲避。

短短五分钟后，火情已无法控制。原来居民们一直以为是生产纸制品的S·E·工厂¹，其实是一家烟花厂。3点半时，100吨易燃易爆物造成了第三次爆炸，结果更为严重。爆炸后，整条托伦斯街没有一栋房屋幸存。该街道所属的麦克霍特小区（Mekkelholt）是一个蓝领居民区。这里有四百栋住宅完全夷毁，另有一千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至少20人丧生，受伤者超过900人。

灾难过后，人们的反应，从难以置信和震惊不已，逐渐化为愤怒与问责。这片烟花厂竟然明目张胆地违反最基本的安全规定，一直运营了若干年。而政府方面的检查人员却一直只是例行公事地到期发放营业许可证。更有甚者，当地政府和救援部门，竟然都对批准在住宅区内建造此烟花厂一事毫不知情。看来，荷兰政府已经犯了玩忽职守罪。

与此同时，在万里之遥的加拿大沃克敦镇，生活在平静地进行，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之处。然而，在表面的正常之下，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一场变化正在无声无息地潜入，永远地改变了这座小镇。这里遭到牲畜排泄物污染的水源，通过未能有效密封的井壁进入水井，在加氯系统失灵的自来水厂又未能得到适当处理，就这样进入了各家各户。没过几天，镇上就有两千人——几乎是全镇人口的一半——严重发病，并有七人死亡。

事发之后，这里也是一片哗然、诘责不断。居民得知，负责全省饮用水安全的安大略政府以“清冗提效”为由，明令解散了负责公众健康体系中的若干关键部门。尽管省府内有专家和机构一再强调指出，对环保和保健费用的削减如不慎重，势必危及公众健康，但省府始终不予理会。在“精简节约”和“执行市场经

济”的方针指导下，裁减了检查员总数，关停了检测实验室，并取消了法定的呈报制度。

恩斯赫德镇和沃克敦镇的这两起悲剧，揭示出发达国家所正面临的可怕趋势。这些国家的政府，目前或者正在放弃——以“精简”为名——自己的指导与保护职能，或者将其转交给私营机构承担。然而，这些对保障公众安全至关重要的责任，是难以指望私营部门承担的。

1999年11月，意大利福贾市（Foggia）一座位于蓝领住宅区的五层公寓楼突然于夜间坍塌，造成50多人惨死。调查人员相信，建筑标准未能得到严格实施，施工中更发生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随后的检查行动发现，与此公寓楼同时建造的其它建筑，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结果是紧急疏散有关住户。

在1999年8月土耳其发生的地震中，死亡人数高得异乎寻常，原因就在于不少建筑不符合抗震标准。据揭发，那里的市政官员同建筑承包商相勾结，使不符合标准的建筑得以蒙混过关。此事虽引起轩然大波，但最后仍不了了之。事过一年，仍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而且在得到震后重建合同的承包商中，仍有原来修造了不合格房屋的建筑商在内。

1999年夏，比利时在鸡肉、蛋类、奶类、猪肉、牛肉和面食等许多食品中，检测到了有害物质二氧芑和聚氯联二苯（又称PCB）。有人将这两种可能致癌和导致畸形的化学制品掺入动物脂肪，再用来饲喂家畜。在此之前，调查疯牛病时发现的以制肉工业的副产品充当饲料的做法，已经引发了公众的严重不满，然而，类似的做法仍然在许多采用现代畜养方式的农场流行着。在查知这一食品污染问题后，比利时有关当局将此消息封锁了四个星期才予以公布，而解释这一延误的官方理由，是责令有关生产厂商销毁自己的产品乃非同小可之举，政府需要进一步检测以资确认。

嗣后，比利时在当年夏天以现有标准过严、生产厂家难于达标为理由，提高了食品中二氧芑的允许含量。

这种以降低安全标准的做法代替斥巨资提高产品质量的对策，自然大中工业界游说团体的下怀。结果是政府越来越多地迎合工业界的要求，置公众于危险地位而不顾。

在美国，人们发现，有关杀虫剂的立法新条文，是由某个工业游说团体捉刀起草的，然而当发现时，该条文已在立法机构通过。正式法律条文的文字，几乎与先前游说团体代拟的草案毫无二致。新法律使得监管机构更难于限制已有的杀虫剂产品，新产品也更容易进入市场。原有的法律规定，杀虫剂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能够证明其使用的安全性；而根据新的法律，这一过程恰恰颠倒了过来，即在政府有可能能够确凿证明有害之前，一概准许其市场流通。由于杀虫剂诱发的疾病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得到确认，新法规的弊病就是十分明显的了。

目前形势已日趋明朗，就是西方在上个世纪和更早些时所建立起来的、能够保障公众健康与安全的社会体制与结构，正在大跨步地倒退。如今的新一代政坛首脑和业界领袖，只孜孜于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忘记了、或者没能理解这一经

济所造成的后果，由是破坏着前几代人为减少工业化文明所会造成的恶劣后果而辛苦构筑起来的防范体系。

这样一来，人们所面临的，不单单是一步步失去具体的保护措施与控制手段，更在丧失远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迷失方向，不再意识到它们有存在的理由，不再记得当初它们为什么会形成。前人付出巨大代价从灾难中艰难学得的体验，如今却被弃入遗忘的长河。

艾伦·肯尼迪（Allen Kennedy）在其著述《股东价值论正走到尽头》（*The End of Shareholder Value*）中指出，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期里，大企业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一向树有的长远目标，转而尽可能地谋取眼前得益。如今，公司首脑的主要进账已不再是薪酬，而是股票期权；股东们也一心要从股市中闪电般地获得高额收入。他们所第一关心的，都是要在短时间内取得最大收益。为了这一目的，即使是公司本身的长远利益，也往往会被送上祭台。这位艾伦·肯尼迪以实例证明，为了抬升股值，大公司竟会采取出售公司资产、减少开发经费等手段。如今的致富之路，通常是以高科技为名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公司所有者将首次公开募股之所得纳入自己腰包，尽管此时公司可能根本还不曾创造利润，甚至根本都没有将产品投入市场。该作者还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当有人向一位高层主管人员指出，说他的做法未免缺乏远见时，后者表示说：“为什么要管这个呢……当有人发现这个问题时，我早就不会在公司里了。”

与此同时，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样深信不疑的政府，也将私营企业立为能最有效地生产绝大多数产品和提供绝大多数服务的对象。因此，即使在有些产品或服务绝对要由政府部门提供的情况下，也应当或者效法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或者同后者联合共管。不同意保守主义观念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所谓“第三种道路”的信徒，都对私营方式信任有加，其结果则往往是使公众健康与安全的责任，落到自身利益与公众福祉严重相左的私营企业手中。说是严重相左，是因为它们向基础体系、运营维护、安全设施和人员队伍等方面投入越少，自己的利益便越可观。

对英国伦敦派丁顿火车站机车闯红灯、造成 31 人死亡这一事故的司法调查，明显地揭示出这一利益冲突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肇事火车所属的泰晤士铁路公司（Thames Trains）系一家私营企业，在事故发生一年前，决定不再为自己的机车加装名称为 ATP 的机车自动保护装置，而正是这一装置，起着制动闯红灯的机车、防止列车相撞的作用。在这一事故发生之前，大伦敦地区的索特霍耳（Southall）已经在 1997 年发生过类似的机车相撞事故，险些酿成同样灾祸的闯红灯事件也发生过不止一起，但该公司仍坚持执行了这一决定。泰晤士铁路公司认为，安装 ATP 所需的 526 万英镑花费未免太高。然而，就在取消它的同一年，公司却向股东支付了 423 万英镑的股息，前一年也给股东发放了 325 万英镑红利。

另一记类似的严重警钟是 1998 年初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敲响的。向奥克兰市中心输送电力的主电缆出了问题，导致该市的中心商业区完全断电。使那里恢复功能的种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正常生活根本无法维持，居民和公司人员不得不撤离疏散。正常状态 66 天后才得恢复。事后进行的调查查明，原因是供电的私营

电力公司不顾基础体系的需要，向维修部门大抡板斧。原先在由公共部门负责供电时，总是储有若干备用电缆，以供不时之需。接手的私营公司却认为购置备用器材属于不必要的开支而取消了。

也正是这种狭隘的考虑，导致了福特汽车公司 20 世纪 70 年代的平托型（Pinto）轿车油箱爆炸丑闻。据该公司的内部文件证实，公司高层主管人物竟在估算了召回有关车辆并纠正油箱问题的花费（每辆车 11 美元）和与油箱事故造成死伤的当事人通过司法手段斡旋的费用（每伤一人赔付 67000 美元，每死一人赔偿 200000 美元）后，冷血地认为后一种方案较为合算，因而决定一任油箱出事，宁可事后支付赔偿金。

对于当年福特公司生产的探险者型汽车（Explorer）因发生轮胎层离事故而在多个国家造成至少 150 人死亡的悲剧，调查人员目前也在重新考虑是否与同样的不肯主动解决问题的动机有关。据介入此类事故调查的记者报导，福特公司与生产这些轮胎的凡士通橡胶轮胎公司（Firestone），都不曾向美国的有司当局报告这一问题，甚至当此类事件已在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发生、伤者和死者家属提出诉讼、这两家公司向这两个国家发出召回轮胎的指示，并准备好了应诉后，也仍对此问题缄口不报。在公司方面与原告达成的协议中，包括有诉讼人一方不得将有关证据向外披露一款内容。而如果这些内容能够早些公之于众，伤亡数字无疑会有所减少。

这正应了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²所说的一句话：“不记前失，必蹈覆辙”。

发达国家积多年之经验，认识到当公众与私营企业发生利益冲突时，并不能指望后者为前者着想。这一经验是用许多生命换来的。以这样的高昂代价，我们才一点一滴地、从此国到彼国地逐渐构筑起了为公众服务的基础监管控制体系，形成了保障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的运行过程。而如今，这一基础体系却正在遭到破坏，而破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外界，而恰恰来自政府内部。

我们是不是得再次付出代价，来重新学得这一惨痛教训呢？

最早发表于《新国际主义者》杂志（*New Internationalist*），2001 年 1-2 月合刊，第 331 号。

Ulli Diemer
www.diemer.ca

¹ 正式厂名为 **Smallenbroek Enschede**（荷兰文）。

² 在美国工作毕生的西班牙籍哲学家与作家。